

《三国演义》第四次全国学术讨论会综述

田 荣

1987年10月26日至28日,《三国演义》第四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湖北襄樊举行。会议由中国《三国演义》学会、湖北大学、襄樊大学主办。来自全国26个省市(自治区)的百余名代表参加了讨论会。现将所讨论到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:

《三国演义》研究方法探讨

何满子(上海古籍出版社)认为,《三国演义》就其风格来说,是我们民族共同性格的体现,《三国演义》的群体风格是不应丢掉的。《三国演义》是历史小说,应放到民族文化大的领域内研究。鲁德才(天津南开大学)提出必须更新研究观念。他以宏观的审视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倾向给予反思后,认为古典小说历史化,造成了小说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很少有惊人的突破。小说历史化,可能阻碍了小说艺术化发展。陈年希(上海师大)提出,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,一要从基础方面去研究,二要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宏观研究,如宗教意识、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,三要着手进行《三国演义》研究史的研究。田荣(陕西社联)也提出,不要用史实来苛求艺术虚构,也不要对小说中的人与事进行史学考据。至于把《三国演义》与《红楼梦》相比较,旨在贬低前者的作法是不恰当的。

《三国演义》作者与版本研究

孟繁仁(山西社科院)就太原清徐《罗氏家谱》与罗贯中的关系,报告了他的发现经过与初步研究成果:罗贯中,太原人。祖籍四川成都府。始祖罗仲祥退仕后定居清徐氏沟村。其父罗锦任元代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(或清徐县录事司吏员)。罗氏弟兄六人,贯中为二。曾庆全(中南民族学院)对此提出质疑。他认为,《罗谱》所记罗氏第七代与罗贯中相距甚远。其间三百余年,这与古代修谱则例不合。张国光(湖北大学)除认为,罗贯中不应享有一系列古代小说著作权外,还提出《三国演义》成书在明中叶。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(蒋大器)很有可能就是小说作者。

《三国演义》人物研究

何满子认为,不能用西方的“典型”概念来研究《三国演义》人物。小说人物消溶

在历史（事件）中，作者受限于历史，书中真正有性格的人不多。人物成了某种符号，或者是某种类型的体现。单长江（湖北咸宁师专）不同意这种看法，人物消溶在历史中的说法，并不符合《三国演义》的作品实际。恰恰相反，历史事件是为人物性格服务的。沈天佑（北京大学）认为，“三国”深入人心，正说明作者塑造人物时，没有高度的艺术才力则不会产生这样的客观效果。他对否定小说人物形象的批评，提出了反诘。

诸葛亮研究：常德江（天津石化公司电大）认为，对隐逸待时、意在用世的诸葛亮，小说赋予他飘洒若仙的隐士风采，这与传统的道家学说和当时道教的流行有关；也与作者意在突出诸葛亮的“养高忘机”的超旷情怀和高尚品格有关。儒道二元互补，平衡占主导地位。中国文化心理的分裂状态在诸葛亮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。欧阳代发（湖北大学）认为，诸葛亮一生是在“天时”不利情况下，充分发挥“人谋”作用。其悲剧在于“人谋”未能战胜“天时”。刘上生（湖南教育学院）对诸葛亮才智系统与功能作了剖析。他认为其才智包括才能和智能两个层次。

关羽研究：冯子礼（江苏运河师专）提出，如果说孔夫子是正统士大夫阶级的圣人，那么关夫子则是封建时代小生产者圣人，是下层民众的圣人。关羽的神化和普及，是封建观念支配小生产的表现，也是小生产观念向封建伦理渗透的结果，它也是“儒”与“侠”两种精神融合的产物。于朝贵（西南师大）认为，关羽除了勇武之外，更多地带有儒将风采，是一个被儒化的英雄。关羽的神化，还与中国人崇尚英雄的审美心理有关。

曹操研究：胥惠民（新疆师大）认为，在同分裂势力斗争中，曹操是远见的政治家、杰出的军事家。不仅注解《孙子兵法》，还自撰兵书《孟德新书》。故其是具有丰富经验的战略学家和战役学家。陈松柏（湖南零陵师专）却认为，就曹操而言，反映了作者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相悖。如长坂坡之战，曹对敌方赵云的慈悲实则是对属下的残忍。

《三国演义》思想艺术成就与创作方法研究

许建中（江苏盐城师专）认为，罗贯中在传统的英雄史观的思想中，把伦理道德的评判引入了史学领域，表现出强烈的推崇“力”与“德”相结合的英雄的倾向；在历史发展观方面，罗贯中虽受“天命论”影响，但却接受柳宗元“势”的学说，揭示了历史发展受制于客观趋势和规律性的种种现象；在历史发展动力理解上，罗贯中在南宋“王霸义利”之辩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研究了王道义礼与事理功利统一的问题，表现了在义礼伦理规范下追求功利、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。魏际昌（河北大学）认为，桃园兄弟是一个政治集团。其所体现出的“忠贞义勇互助友爱”的道德，不能看成是封建道德，简单否定。刘绍智（宁夏教育学院）却认为，义有二重性。基本上应该否定。对古典小说的伦理道德，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价，并不意味着否定它的历史地位。卫绍智（河南社科院）认为，《三国演义》创作倾向的矛盾性，是作者在理智上倾向于天命观念、在感情上倾向于人本思想而造成的。